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过渡形态：中国早期 资产阶级构成之谜

马敏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过渡形态：中国早期 资产阶级构成之谜

马 敏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马敏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

ISBN 978-7-5622-5050-0

I. ①过… II. ①马… III. ①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1536 号

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

作者:马 敏◎

责任编辑:郭志刚

责任校对:易 雯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4

字数:199 千字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43.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30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1978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前 言

如果说，中国古代文明历几千年沧桑而始终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之谜，曾吸引了无数中外学者的注意，使他们为之绞尽脑汁而最终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① 那么，可以作出预言，解析这个古老文明在近代人类历史上的沉浮际遇和流转变迁，无疑将使更多的历史学家为之喟然兴叹。然而无论如何，这一课题本身所蕴涵的巨大理论魅力，已经对那些富有远见的历史学家们构成持久的挑战和永恒的吸引。

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就是一个十分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们固然可以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范畴界说它，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我们既不能把这种范畴继续安置在原有封建生产方式的旧框架里，而另一方面，它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相去甚远。再者，如果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运动规律概括为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向上发展过程和由独立国到殖民地的向下沉沦过程，那么，历史的事实是，这两个过程往往是相互交织、难以剥离的。同社会性质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也呈现出同样的复杂性。在许多人看来，买办资本同民族资本是形同冰炭、彼此对立的，然而，一位素有研究的专家却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大量存在着买办向民族资本转化。”^② 尽管中国资产阶级一

① [法] 米凯莱·戴·蒙泰涅（1533—1592）语。引自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页。

② 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开始就区分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对立部分的学术见解仍为许多学者所坚持，但是怀疑开始发生了。有的论者强调：“初步形成阶段”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处在难解难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境地”。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究竟是代表早期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代表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往往是难于捉摸的”^①。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开放、改革的时代潮流澎湃向前，古老的史学领域也正静悄悄地经历着某种前所未有的观念革新。其标志之一，是人们日益注意到历史发展的过程性、阶级性和复杂性，主张用一种更能反映事物普遍联系和动态转化的历史理论框架，替代旧有的过于清晰明了但不无简单化之嫌的认识框架。以资产阶级研究为例，早在粉碎“四人帮”之初，有的学者便高瞻远瞩地提出：“在中国，资产阶级是从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转化过来的，不可能一开始转化就形成一个阶级，它有一段逐渐脱离它前身，达到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过程。”^② 其标志之二，是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以抓主要线索为主的线性思维和表层研究，而逐步转向以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本身为对象的多线索、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化研究。尤其是那种处于长时段、深层次的整个社会结构运动日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有的学者提出，近代史研究应突破政治化史学的狭促格局，从革命转向社会，便集中体现了当前研究方向变化的新趋势。其标志之三，是于传统的考辨和实证方法而外，大量引进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极大丰富了人们探索复杂历史现象的手段，给史学园地注入一派盎然生机。

因此，如果说本文尝试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中提出一种远未成熟的新思路，显然不是关在斗室里冥思苦想的结果，而是从上述史学变革浪潮中不断汲取丰富养分和新鲜启迪的结果。这种新思路概括而言即是，把阶级结构剖析同社会结构演化结合起来，在历史的纵横比较中，用“过渡形态”的总体构想解释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及一系列特点，说明这个阶级为什么不能真正承担

① 姜铎：《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载《学术月刊》，1983年，第11期。

② 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7页。

起中国近代化主干载体的历史使命。

所谓过渡形态，在哲学涵义上，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判断的悖论，是指对立双方之间“亦此亦彼”的中介环节。该中介环节的存在填平了两极对立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又使对立双方的彼此联结和渗透由可能变为现实。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差异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①从动态上看，过渡形态表现为矛盾运动由旧质向新质，由肯定方面向否定方面转化的中间阶段。在此阶段旧的因素不断消亡、新的因素不断成长，然而此消彼长的过程又尚未达到根本质变的程度。总之，过渡性突破了事物类属的固定不移的界限，使事物呈现出模糊性或不确定性特征。例如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文昌鱼这类脊索动物的存在，模糊了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的界限；“始祖鸟”的存在，使爬行类动物和鸟类的区分变得十分困难；而兼有自养和异养特点的裸藻、盘藻和团藻这类生物的发现，又使植物与动物的绝对区别不复成立。此外如语言、信息等等，均兼有物质和观念的二重特性。大量事实证实了过渡形态的客观存在。

以过渡形态来规范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所由产生的早期资产阶级，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边界清晰的新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形态，而是正从旧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形态中分化出来、尚未最后定型的结构。这些结构的显著特征，即是正处于初生期的不断构造过程中。由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早期资产阶级本身形象模糊和不伦不类就并非不可思议了。也正由于此，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格，似乎并非纯然是经济力量薄弱所致，而自有其社会和阶级结构方面的原因。因此，如果说，过去我们为了从具体到抽象、简约明确地把握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资产阶级的大体轮廓，曾不得不以历史的丰富性为代价大量省略了中介环节，那么，今天需要反省的则是：在对近代社会和早期资产阶级这类明显的过渡形态的考察中，中介的大量省略，是否会影响对其本质的正确把握？逻辑证明，为了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有血有肉地进行历史研究，我们必须适当地恢复某些被省略的中介环节，使连续转化过渡的历史行程呈现本来面目，换言之，即以历史的态度来研究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5页。

国近代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历史。

经验告诉我们，提出一个课题或构想可能是相对容易的，然而，要把这种课题或构想变成具体研究成果，却不得不付出百倍的勤奋和心血。这里，重温一下马克思的格言或许不无益处：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5页。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过渡型社会与早期资产阶级	(1)
第一节 中国近代社会的持续过渡性	(1)
一 近代一体化趋势与不同过渡类型	(2)
二 非稳定结构与寻求新平衡	(7)
三 过渡轨迹与矛盾特色	(14)
第二节 早期资产阶级概说	(19)
一 以往研究的简略回顾	(19)
二 本文使用的概念	(20)
三 早期资产阶级的基本特征	(24)
四 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演变的异与同	(30)
第二章 特殊的形成道路	(33)
第一节 阶级发生模式	(33)
一 “冲击—反应”模式的修正	(34)
二 构造方式与轨迹	(38)
第二节 新途与故道——主体转化途径	(39)
一 突发式的“新途”	(40)
二 渐变型的“故道”	(44)
第三节 官、洋之间——主体存在方式	(50)
一 托庇洋商	(50)

二	求助官府	(58)
三	商办企业的左依右傍	(69)
第三章	畸形的内部结构	(79)
第一节	经济结构透视	(79)
一	分化趋势	(79)
二	粘连性	(94)
第二节	政治结构述略	(103)
一	政治分野与层次划分	(103)
二	政治代表与阶级基础	(109)
第三节	绅商——一个典型的过渡阶层	(115)
一	缘起和属性	(116)
二	过渡特色与中介功用	(123)
第四章	社会组织形态的过渡性	(129)
第一节	形成中的新式社团	(129)
一	商会组织建构	(130)
二	商会与新式社团群落	(137)
第二节	二重性——新式社团共性特征	(145)
一	商会的二重性	(145)
二	其他社团组织的二重性	(154)
第五章	过渡型心理结构	(160)
第一节	早期工商资本家心理特征	(160)
一	情绪特征	(160)
二	心理特质	(164)
三	总体结构特征	(169)
第二节	新式知识分子思想和心理特征概述	(173)
一	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崛起	(173)
二	思想和心理特征	(174)
三	两种类型	(181)

结 语 名不副实的主干载体——早期资产阶级与近代化	
.....	(186)
一 近代化的涵义.....	(186)
二 近代化的推动力量.....	(189)
三 早期资产阶级的近代化努力及其失败.....	(192)
四 历史的沉思：早期资产阶级何以失败？.....	(196)
五 社会历史土壤：一种强大的制约因素.....	(198)
后 记	(204)

图 表 目 录

表 1	1949 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美国和印度比较·····	(6)
表 2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	(10)
表 3	1872—1894 年本国新式企业情况·····	(23)
表 4	1894—1913 年本国新设近代企业情况·····	(23)
表 5	十个行业早期产业资本家的来源 (1872—1913 年) ·····	(42)
表 6	两个时期中国产业资本家来源比较·····	(43)
表 7	上海早期民族机器工业创办情况 (1866—1894 年) ·····	(44)
表 8	上海早期轮运业若干轮船公司及轮只的资本构成·····	(51)
表 9	19 世纪华商附股外国企业情况·····	(52)
表 10	外资厂矿和中外合办厂矿比较 (1895—1913 年) ·····	(55)
表 11	商办企业历年投资总额及其指数 (1872—1913 年) ·····	(71)
表 12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商办厂矿所借日债统计·····	(73)
表 13	若干商办企业享有的专利权·····	(75)
表 14	设在通商口岸和腹地城市的华资工厂比较 (1895— 1913 年)·····	(81)
表 15	各类公司数量及资本统计 (1912 年)·····	(94)
表 16	高阳织布区织卖货机户和织手工机户比较 (1912— 1913 年)·····	(97)
表 17	严信厚等人近代企业投资额估计 (1911 年止)·····	(107)